

19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的媒介策略

——以“京海之争”为例

刘 涛 黄德志

内容提要 本文以报刊媒介与文学活动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对1930年代的“京海之争”进行考察,探讨报刊媒介在这场文学论争中所发挥的作用,分析左翼文学介入这场论争的根本目的以及为了赢得文学话语权所采取的媒介策略。同时,探讨左翼文学运动的媒介策略是如何营造1930年代的革命文学氛围并最终树立话语权威的。

关键词 “京海之争” 左翼文学运动 媒介策略 《大公报》《现代》《申报·自由谈》

刘 涛,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210024

黄德志,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221116

文学的存在与传播离不开媒介,媒介不只是文学传播的物质载体,同时也是营造文学氛围的工具。媒介虽然不能够提供文学的内容,但是却可以决定哪些文学作品和文学观念可以呈现在读者面前,进而影响读者对于周围文学环境的感知。就现代文学而言,报刊媒介与文学作品的问世、外国文学的译介以及形形色色的文学论争均有密切的联系,这种以报刊媒介为核心的现代文学传播方式对于文学环境的生成至关重要。曹聚仁认为“中国的文坛和报坛是表姊妹,血缘是很密切的”^[1]。自新文学之始报刊媒介与新文学就结下了不解之缘,《新青年》为“五四”新文学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媒介平台。“文学研究会”旨在“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2]的宏愿也是建立在《小说月报》、《文学旬刊》等文学媒介之上的。三十年代随着社会政治氛围的转变,涌现了大量左翼文学刊物,根据茅盾和鲁迅编订的《中国左翼文艺定期刊编目》统计,自“革命文学”运动兴起至1934年,左翼文学定期刊物大概有18种以上^[3],泛左翼文学刊物则更是难以计数。这些左翼刊物的出版为营造当

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1批面上资助项目“外国来华作家与中国现代文学”(2017M611850)阶段性成果。

[1]曹聚仁:《文坛五十年》,〔上海〕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

[2]《文学研究会简章》,1921年《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一号。

[3]茅盾、鲁迅:《中国左翼文艺定期刊编目》,〔北京〕《鲁迅研究动态》1980年第1期。

时的革命文学氛围提供了必要的媒介支持。进入四十年代,纷繁激烈的文学活动总是离不开报刊媒介的推波助澜。例如,从延安开始的“民族形式”问题讨论,之所以能够被引入国统区成为全国范围的文学论争,与《文学月报》和《新华日报》的积极介入不无关系。报刊媒介总是以其独特的方式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进程,甚至从某种角度来讲,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是一部报刊媒介对文学活动的影响史。

报刊媒介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是总体而言,报刊媒介对于现代文学的影响是一种外部影响,主要通过媒介手段来渲染一种文学氛围,进而影响读者对于当下文学环境的认知。我们若以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考察1930年代的“京海之争”,就会发现报刊媒介在这场文学论争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并可揭橥左翼文学运动是运用何种媒介策略营造1930年代的左翼革命文学氛围,进而最终成为文坛主流话语。

“京海之争”仅是1930年代纷繁复杂的文学论争中之一例,却体现了当时报刊媒介对于文学活动的普遍影响力,也是1930年代文学环境的典型缩影。学界普遍将沈从文在1933年10月18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文学者的态度》视为“京海之争”开始的标志^[1]。在这篇讽喻意味颇浓的文章中,沈从文借讲述家中大司务老景对待工作的认真负责对当时文学界“玩票白相”的虚浮风气进行了批评^[2],呼吁作家以认真的态度对待文学。这篇文章秉承了沈从文一贯以来的文学观念,也是他对三十年代文坛风气的隐晦批评。

沈从文本想通过此文宣传自己的文学主张,可惜文章见刊之后便石沉大海,未在文坛激起任何涟漪。但是,执着的沈从文很快又寻找到了伸张自己文学观念的新机。大约一个半月之后,苏汶为了表达将上海作家与“海派”文人相等同的不满,在1933年12月的《现代》杂志上以《文人在上海》为题对上海作家进行辩护^[3]。沈从文在见到苏汶的文章后立即意识到机会的来临,旋即以《论“海派”》回应苏汶。他在文章中不仅赞同苏汶对于“海派”的看法,而且还总结了自己的“海派”观念:“过去的‘海派’与‘礼拜六派’不能分开。那是一样的东西的两种称呼。‘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为了我们今天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4]而对于了解沈从文的读者来讲,这种“借尸还魂”的伎俩一眼便可识破。早在1930年发表的《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中,他就将张资平和“礼拜六派”作家视为“海派”,而将“良友”一流的人物视为“新海派”^[5]。在随后如《论中国创作小说》《窄而霉斋闲话》《记丁玲女士》等许多文章中,沈从文都将“海派”视为不良文学风气的代名词,他认为“在‘创作态度’上,我们似乎也需要一点儿严肃才行……缺少这个顽固坚实的态度,在上海,是可以从那类所谓都市趣味的新海派作者的成就,可以明白的”^[6]。在沈从文看来,“海派”文学与《文学者的态度》中批判的“玩票白相”文学在本质上是一丘之貉,所以可以借助批判“海派”文学之机将自己之前的文学主张来一次旧调重弹。

沈从文积极介入文坛纷争的行为不仅是为了宣扬自己的文学观念,更是为了取得文学媒介的话语权。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创刊的第二天(即1933年9月24日),作为实际主编的沈从文就在致沈

[1]沈从文《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本身并未涉及“京海之争”,学界长期以来以此作为“京海之争”起点的看法是很值得商榷的。但是由于篇幅所限,加之并非本文主要研究目标,故而关于“京海之争”的起点问题笔者将另行撰文探讨。

[2]沈从文:《文学者的态度》,《大公报·文艺副刊》1933年10月18日。

[3]苏汶:《文人在上海》,1933年《现代》第四卷第二期。

[4]沈从文:《论“海派”》,《大公报·文艺副刊》1934年1月10日。

[5]沈从文:《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1930年《新月》第三卷第一期。

[6]沈从文:《现代中国文学的小感想》,1930年《文艺月刊》第一卷第五号。

云麓的信中这样说道:“《大公报》弟编之副刊已引出,此刊物每星期两次,皆知名之士及大教授执笔,故将来希望殊大,若能支持一年,此刊物或将大影响北方文学空气,亦意中事也。”^[1]沈从文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希望借助《大公报》的媒介地位通过文学副刊影响文坛的意图,可见他在主掌《大公报·文艺副刊》之初就很清楚媒介对于获取文学话语权的重要意义。《文学者的态度》其实是沈从文利用《大公报·文艺副刊》争取文坛话语权的最初尝试,当然,这一次无功而返的尝试也让他认识到这份初出茅庐的新刊物要想在文坛赢得一席之地就必须借助文学论争这一不二法门。可以说,当沈从文裹挟《大公报·文艺副刊》介入苏汶的“海派”话题时,除了文学理念上的相近,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刺激好斗的上海文坛,企图博取文坛的关注。甚至,为了达到预期的效果他一改之前平和舒缓的文风,有意以强烈的言辞刺激上海作家。他直言北方作家不该姑息“海派”风气并认为“海派如果与我所诠释的意义相近,北方文学者,用轻视忽视的态度,听任海派习气存在发展,就实在是北方文学者一宗罪过。”^[2]他将北方作家视为上海文坛“救世主”的言论明显是故意夸张,意在以极端的话语方式挑起论争。沈从文的这种言论风格在之后的论争文章中并不鲜见,这与沈从文的“京派”文学创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见,由于三十年代的媒介话语争夺日趋激烈迫使作家的行文风格也逐渐尖锐,甚至与秉持的文学理念背道而驰。沈从文以这样一种别有用心的方式终于将自己与《大公报·文艺副刊》共同推向了论争的风口浪尖,一场更大范围的论争也就在所难免。

二

沈从文的言论彻底点燃了上海作家的论争激情,在持续两个多月的“京海之争”中,许多身居上海的作家纷纷加入到论争的行列。他们在“京海之争”中的立场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关注上海作家的生存状况。这些作家明显是在呼应苏汶《文人在上海》中认为上海作家生活不易的观点,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只是苏汶文章的部分意图。一些学者认为苏汶仅是借用“海派”之名贬损左翼文学,“其目的是欲将左翼作家于无形中统统纳入‘海派’圈子里去”^[3]。吴述桥先生甚至认为“京海之争”完全是以苏汶为首的“第三种人”针对左翼文学蓄谋已久的一场阴谋。这场阴谋起源于“第三种人”发现“左联”成员何家槐抄袭徐转蓬小说一事,他们企图利用这一丑闻攻击左翼文学^[4]。苏汶对于“海派”作家与上海文人的区分仅是这场阴谋的开始,它是在为其他“第三种人”作家将“何家槐抄袭事件”定义为“海派”风气进而以“海派”的恶名排挤上海左翼文学做铺垫。不过,孙琳先生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苏汶发表《文人在上海》可能与朱湘之死有关。朱湘由于生活贫困潦倒于1933年12月4日投江自杀,苏汶与朱湘曾经同为安徽大学同事,在得知朱湘自杀以后身为《现代》编辑的苏汶立即在转年1月的《现代》杂志上刊发了有关“朱湘之死”的专题文章,可见朱湘的遭遇给苏汶带来了极大的触动,《文人在上海》很可能是在这种背景下创作的^[5]。我认为上述各方观点均有一定的道理,我们没有理由要求苏汶在文章中仅表达一种意图,攻击左翼文学与反思文人生存状况都应是这篇文章的应有之义。

这里值得关注的是森堡的言论。他认为上海文人迫于现实压力急迫“要钱”而被讽为“海派”实属

[1]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87页。

[2]沈从文:《论“海派”》,《大公报·文艺副刊》1934年1月10日。

[3]吴立昌:《论20世纪30年代“京”“海”之争》,《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4]吴述桥:《论“第三种人”在京海之争中的角色及影响》,[长春]《文艺争鸣》2011年第11期。

[5]孙琳:《“海派”的历史多面性研究——以“京海之争”为核心》,[成都]《当代文坛》2016年第5期。

不公,“这里所谓‘要钱’,应该就是上海(中国)文人的生活苦的表现和说明,这跟一般人说的军阀,官僚等‘要钱’的意思是绝对没有相同之点的。”他对于上海文人生活状况的观察似乎与苏汶如出一辙,而苏汶将这位“左联”作家的文章刊发在自己主编的杂志上也说明了对于作者观点的认可。不过,森堡却为文人摆脱现实的艰辛提供了一条耐人寻味的道路——“成为大众中间的一员”,“跟大众一同去解决问题”^[1]。森堡看似在呼应苏汶的观点,其实是巧妙地将左翼文学的集体主义话语融入到话题的阐释之中。相比秉持个人自由主义的“第三种人”在文人未来出路问题上的犹豫徘徊,森堡的言论虽然仅是一种预言却至少为上海作家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而之后的左翼作家尽管在论争的着眼点上与森堡不同,却依旧以统一的左翼话语对“京海之争”进行分析阐释,这也体现了左翼文学在媒介论争中的话语一致性。

与苏汶立场相近的还有阿曇。他在《申报·本埠增刊》发表《论“卖文为活”》指出文学也是商品,靠文章赚钱吃饭和做工吃饭都是一样正当的^[2]。其言论遭到了青农的攻击,认为“其作用只有给‘海派’文人一种‘助纣为虐’”^[3]。于是阿曇又在《申报·本埠增刊》上以《谁替海派辩护》为题再度强调卖文并不可耻,“只是卖文也不能构成‘海派’”^[4]。阿曇对于上海文人“卖文为活”的同情在后来的“京海之争”研究中鲜被提及,这当然不是因为阿曇的言论无关痛痒,不然青农何必要进行回应呢?不重要的并非阿曇的言论而是他发表言论的媒介,他的文章仅刊于《申报·本埠增刊》,“本埠”二字已经道出了媒介的局限性,“增刊”更说明了这一版面的无足轻重,事实上这份增刊的受众仅限于上海市区内的读者,这无形中限制了阿曇文章的传播范围。恰恰值得深思的是,“京海之争”的争论文章主要集中于《申报·自由谈》之上,既是讨论同一主题,又是同一家报纸,为何阿曇的文章不能出现在更具媒介影响力的《申报·自由谈》版面上呢?这样岂不更能体现“自由谈”的“自由”况味?事实上这是绝无可能的。此时《申报·自由谈》在黎烈文的编辑主持下思想明显左倾,成为左翼文学重要的舆论阵地。在三十年代激烈的文学权力斗争中,任何文学派别都不会轻易地让出自己的媒介空间,即使阿曇的立场与左翼文学并不对立,非左翼的言论也不可能获得左翼文学媒介的支持。可见,在三十年代作家的言论地位与其依托的媒介平台之间存在明显的联系。

第二类立足于“海派”文学的厘清与批判。所谓的“第三种人”作家对于这一问题最为关注,如上文所言,苏汶言论的另一个隐晦的意图就是为将“海派”的恶名加之于左翼文学做准备。按照吴述桥先生的说法,“第三种人”攻击左翼文学的策略是“他们先说‘文人在上海’不容易,‘论海派文学家’,表示要和真‘海派’划清界限,再谈‘怎样清除海派’,然后公开揭发‘何家槐小说别人做的’,最后表示‘清算何家槐’。由此大肆攻击左翼作家的‘海派’行为”^[5]。这里涉及的作家主要有苏汶、韩侍桁、青农、毅君、杨邨人、林希隽等,虽然“海派”仅是这些作家进攻左翼文学的话语工具,但是其中一些作家对于“海派”的辨识与批判还是值得探讨的。

在“京海之争”中最早提出清除“海派”的是韩侍桁。他在1934年1月1日《文艺月刊》上发表了一组随笔《文艺丛谈》,其中一篇文章专门对苏汶的“海派”观点进行回应。他认为苏汶以生存问题为“海派”辩护是不正确的,号召上海文人要想不被蔑称为“海派”,“首先就应该起来,从文坛上把这些不折

[1]森堡:《文人的生活苦》,1934年《现代》第四卷第四期。

[2]阿曇:《论“卖文为活”》,《申报·本埠增刊》1934年2月2日。

[3]青农:《“商业竞卖”的文人》,《申报·本埠增刊》1934年2月5日。

[4]阿曇:《谁替海派辩护》,《申报·本埠增刊》1934年2月22日。

[5]吴述桥:《论“第三种人”在京海之争中的角色及影响》,〔长春〕《文艺争鸣》2011年第11期。

不扣的海派的文人扫除。”^[1]与韩侍桁稍有不同,青农在批评“海派”文人的同时对于沈从文《论“海派”》中自命不凡的“京派”作风也颇为不满。他认为“在上海的非‘海派’文人应该自己起来澄清,不必麻烦‘京派’文人劳师远征”^[2]。毅君也表示上海的非“海派”作家应该主动清除这股“海派”文风,并进一步要求“廓清‘海派’的运动应当扩展到整个著作界才是”^[3]。“京海之争”与“第三种人”借用“海派”之名揭发“何家槐抄袭事件”是两场内涵完全不同的文学论争,而苏汶、韩侍桁、青农、毅君等作家对于“海派”现象的阐发只能算作两场论争之间的一个交集。事实上“第三种人”在这两场论争中的影响均算不上惊艳。何家槐虽然最终承认了抄袭,但是他的个人行为并未波及到左翼文学,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由于“第三种人”仅是在工具层面利用“海派”问题,他们的言论也并未引起“京海之争”中其他各方的特别关注。应该讲,“第三种人”在这两场论争中的平庸表现与其媒介策略的失误存在直接联系。他们将涉及“何家槐抄袭事件”的言论散布于《现代》、《文艺月刊》、《申报·自由谈》、《文化列车》等不同刊物之上,这种策略看似可以拓宽话题的传播范围,却也导致了媒介话语力量的分散,不能集中话语优势博取媒介关注度,而且这种揭发文坛黑幕式的小报伎俩是当时主流文学媒介所不齿的行为。甚至,我们今天也是在研究大量的文学刊物之后才得以窥探到“第三种人”介入“京海之争”的真实用意,而对于当时的普通读者而言更加不会关注到“第三种人”在这场论争中的真实意图。

第三类上海作家认为“京派”与“海派”都应成为批判的目标。必须强调的是,过去往往认为仅有左翼文学持有这一立场,实际上盘踞于上海的国民党右翼文学对于这场论争的态度与左翼文学竟如出一辙,只是在之前的研究中这一点被完全忽略掉了。在1934年2月12日的《社会新闻》上曾出现过一篇题为《京派坎?海派坎?》的未署名文章。作者将“京海之争”视为毫无意义的文坛乱战,“海派也好京派也好,反正都是一丘之貉,何用大打出手各显丑脸呢!”^[4]由丁默邨、李士群等人主编的《社会新闻》是国民党CC系的外围保守刊物,它代表了国民党右翼势力的思想立场,文章虽未署名却暗含了右翼文学对于这场论争的基本态度。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喉舌刊物《汗血周刊》上刊发的另一篇文章则更加体现了右翼文学对于这场论争的态度。这篇署名为王梦非的文章《海派与京派之末日》发表于“京海之争”结束后不久,颇有右翼文学势力对于这场论争的总结之意。作者在评价“京海之争”时不经意间流露出对于1930年代各种文坛现象的基本态度,“年来中国的文坛,正像全个中国一样的骚乱,除了纷扰的内忧;还有不少的外患,像什么幽默,鸳鸯,蝴蝶,已自闹不清;还有什么普罗,同路人,第三种人,来大凑其热闹,集亡国文化之大成;此时更再来一个海派,京派,好了!这不是雪上加霜,火上添油,硬要把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来根本粉碎吗?”^[5]在右翼文学看来,包括“京海之争”在内的各种文学论争都是中国文坛“骚乱”的罪魁祸首,故而它根本不屑于介入到文坛论争的“浊流”中来。当然也正是在这种官方统治话语的倨傲态度之下,右翼文学不愿降尊纡贵地以平等的身份介入到“京海之争”的讨论中来,而是乐于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这场论争指手画脚,最终导致右翼文学在这场论争中处于媒介话语的“缺位”状态。

反观左翼文学,它对于糟粕的“海派”文风和北方文人的自命不凡一样颇为不满,但是左翼文学更

[1]韩侍桁:《文艺丛谈》,1934年《文艺月刊》第五卷第一期。这组随笔中有关“京海之争”的部分在1934年被韩侍桁收入文集《小文章》时改名为《论海派文学家》。

[2]青农:《谁是“海派”?》,《申报·自由谈》1934年1月29日。

[3]毅君:《怎样清除“海派”?》,《申报·自由谈》1934年2月10日。

[4]佚名:《京派坎?海派坎?》,1934年《社会新闻》第六卷第十四期。

[5]王梦非:《海派与京派之末日》,1934年《汗血周刊》2卷13期。

愿意在论争中表达自己的态度立场。曹聚仁在《京派与海派》中提出“今日之‘京派’有以异于‘海派’乎?”认为二者并无本质上的差别,“应当英勇地扫荡了海派,也扫荡了京派,方能开辟新文学的路来!”^[1]曹聚仁的观点基本奠定了左翼作家在这场论争中的态度立场。徐懋庸在《“商业竞卖”与“名士才情”》中对京海双方的剖析更加深入。他反驳沈从文将“海派”视为“商业竞卖”与“名士才情”的结合的看法,认为“文坛上倘真有‘海派’与‘京派’之别,那末我以为‘商业竞卖’是前者的特征,‘名士才情’却是后者的特征”^[2]。徐懋庸实则洞悉到了“海派”与“京派”之间最为根本的区别。如果说曹聚仁认识到了京海双方的共性,那么徐懋庸则总结出了二者各自的特性。

在曹徐二人之后,鲁迅也加入了论争。鲁迅在北京和上海都生活过很长时间,对京海文学均有深切的感性体验,加之一贯独到的文化批判视角,使得他对京海双方的批判入木三分。鲁迅以栾廷石为笔名于1934年2月3日、4日连续两天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对“京海之争”的看法。他认为“‘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闲而已”^[3]。鲁迅是在以左翼文学的革命话语阐释“京海之争”,他超出了地域文学之争的范畴将“京派”与“海派”视为统治阶级的文化代表。“北方人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人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就有闲阶级而言,我以为大体是的确的。”^[4]这里的“有闲阶级”仍然是“帮闲”文人的代称。鲁迅此前就曾以革命文学的立场批判过“帮闲文学”,“帮闲文学实在就是帮忙文学”^[5],帮闲的对象自然就是统治阶级,正所谓“帮闲,在忙的时候就是帮忙,倘若主子忙于行凶作恶,那自然也就是帮凶。”^[6]所以,在鲁迅的逻辑中,无论是京派“官的帮闲”还是海派“商的帮闲”于本质上就并无什么区别了,它们都应是左翼文学的批判对象。我们可以看到以曹聚仁、徐懋庸和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始终是以《申报·自由谈》为主要媒介介入这场论争的,而且他们都保持了高度一致的态度立场并且自觉地以左翼文学的话语方式解读这场“京海之争”,而这种做法明显有利于向普通读者表明左翼文学在这场论争中的态度。

三

在众多上海作家介入这场论争之时,北方文坛则十分沉寂,仅是在论争渐入尾声之时师陀才代表北方作家做出了一点回应。然而他的回应也是意在化解双方矛盾,他认为沈从文的观点在本质上与上海左翼作家并无不同,甚至直接表示“据历次的经验,这笔战开不了的”^[7]。师陀的言论代表了北方作家息事宁人的态度,而考虑到这篇文章是通过《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的,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沈从文此时心态的转变。甚至,北方舆论界对于“京海之争”也颇不以为然。天津《益世报》上一篇署名弗康的文章就认为京海双方是五十步笑百步,“大家不过为吃饭而已,因为吃饭时,有肥鱼大肉,萝葡青菜之分,于是乎文坛上亦有海派京派之别了!”^[8]言下之意京海双方并无孰优孰劣之分,完全没有争论的必要。北方作家的冷淡态度让沈从文倍感孤独,加之论争的走向也超出了他的预想。最终,沈从文以一篇《关于“海派”》完成了自己在“京海之争”中的谢幕。他失望地表示上海作家狂轰滥炸式的

[1]曹聚仁:《京派与海派》,《申报·自由谈》1934年1月17日。

[2]徐懋庸:《“商业竞卖”与“名士才情”》,《申报·自由谈》1934年1月20日。

[3]栾廷石(鲁迅):《“京派”与“海派”》,《申报·自由谈》1934年2月3日。

[4]栾廷石(鲁迅):《北人与南人》,《申报·自由谈》1934年2月4日。

[5]鲁迅:《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4-405页。

[6]鲁迅:《帮闲法发隐》,《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9页。

[7]师陀:《“京派”与“海派”》,《大公报·文艺副刊》1934年2月10日。

[8]弗康:《京派与海派》,《益世报》1934年2月5日。

回应故意曲解了他的本意^[1],事实上,沈从文的这篇文章也宣告“京海之争”基本接近尾声。

时隔八十多年再来审视这场论争,我们会发现“京海之争”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文学成果,在犹如疾风骤雨般地众声喧哗之后,上海左翼文学获得了最终的话语权。然而,为何左翼作家要介入“京海之争”,又何以能够最终取得话语优势呢?这才是我们最值得思考的问题。

仅从“京海之争”本身去找寻问题的答案是徒劳的,我们需要从1930年代文学活动与报刊媒介的关系来探究这一问题。左翼作家选择介入“京海之争”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诱因是此时沈从文媒介身份的巨大变化。相比几年前浪迹上海文坛以“文丐”自居的普通作家,此时的沈从文一跃成为当时国内舆论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之一——《大公报》的文学副刊编辑,他的媒介地位也伴随着《大公报》的全国影响力而水涨船高。同时,由于沈从文的审美趣味与北方作家群体颇为接近,《大公报·文艺副刊》在创办伊始就云集了许多北方知名作家。然而,《大公报·文艺副刊》在北方地区的悄然兴起是以争取全国范围的文学领导权为己任的左翼文学运动所不能容忍的。而自19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兴起以来,其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上海,左翼文学在北方的影响力始终有限。所以,上海左翼作家一直在寻找挑战北方作家群体的机会,而“京海之争”无疑为其提供了再适合不过的机遇。从本质上来讲,这不是一场纯粹的文学论争,而是一场媒介话语权力的政治斗争。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师陀就认为“‘京’‘海’两派看起来是写作态度问题,骨子里却含政治问题”^[2]。也许当时的北方作家与师陀一样,早已看破玄机,故而标榜“远离政治”的北方作家群体才会选择集体沉默。另外,左翼文学要从上海纷繁的文学派别中脱颖而出占据文学媒介的主导话语就必须在“京海之争”这样的文学论争中有所作为,否则很快就会被其他文学派别的声音所掩埋。总之,左翼作家介入“京海之争”的根本原因就是为了争取在文学媒介中的话语优势。

左翼文学介入文坛论争的案例在1930年代屡见不鲜,而且几乎每次都会在论争中占据一定的话语位置。在“京海之争”中也不例外,这主要得益于左翼文学行之有效的媒介斗争手段。一方面,左翼文学十分重视维护自己的媒介阵地。《申报·自由谈》作为这场“京海之争”重要的舆论媒介始终被左翼文学牢牢把持,它刊载的有关这场论争的言论明显具有左倾色彩。左翼作家的言论自不必说,即使如“第三种人”的青农、毅君批判“海派”的言论由于与左翼文学立场相似也可以得到发表,但是像阿曇这样与左翼文学没有任何交集的观点就绝不可能被《申报·自由谈》采用,这就可以让普通读者切实感受到左翼文学介入这场论争的态度。另一方面,左翼文学强调论争中的组织纪律,特别是在文学媒介中要始终保持左翼话语的高度一致。例如,鲁迅在批评“京派”文人的同时也流露出了一些期许,在《“京派”与“海派”》的结尾他写道:“但北平毕竟还是古物,且有古都的人民。在北平的学者文人们,又大抵有着讲师或教授的本业,论理,研究或创作的环境,实在是比‘海派’来得优越的,我希望着能够看见学术上,或文艺上的大著作。”^[3]这句话实际体现了处于左翼文学运动中的鲁迅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是坚持独立的思想意识;另一方面又必须在公开的媒介空间中保持与左翼话语步调的一致。但是,这种作家个人与左翼文学之间的话语拮据往往很容易被左翼文学组织严密的媒介话语给抹平,留给读者左翼文学团结一致声势浩大的印象。

当然,在1930年代左翼文学的做法并非是独门武功,各个文学流派都会依仗媒介之力相互攻讦,这也几乎成为了这一时期文学论争的基本套路。但是,为何仅有左翼文学能够通过媒介手段占据三

[1]沈从文:《关于“海派”》,《大公报·文艺副刊》1934年2月21日。

[2]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书简录》,〔北京〕《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1期。

[3]栾廷石(鲁迅):《“京派”与“海派”》,《申报·自由谈》1934年2月3日。

十年代文坛主流话语呢?从媒介角度来讲,左翼文学利用文学媒介参与论争的目的与其他文学流派存在本质区别。其他文学流派往往仅将媒介视为论争的渠道,围绕具体论争话题在媒介上展开讨论,目的是能够在论争中获取胜利。而左翼文学更注重在论争过程中的影响力和文学媒介对于话语氛围的塑造。因为左翼文学在实践中发现了报刊媒介具有营造文学氛围的强大功能,三十年代的读者对于文学的认知依赖于文学刊物,而文学刊物中所呈现的文学景象实则是经过编辑选择、加工后所展现的景象。换句话说,文学刊物反映的文学景象实际上与现实的文坛是存在差距的,这个媒介构成的“景象”被美国学者利普曼称为“拟态环境”。他认为:“我们尤其应当注意一个共同的因素,那就是楔入在人和环境之间的虚拟环境。他在虚拟环境中的表现就是一种反应。然而,恰恰因为那是一种表现,那么产生后果——假如它们是一些行动——的地方,就不是激发了那种表现的虚拟环境,而是行动得以发生的真实环境。”^[1]媒介“虚拟环境”虽然与真正的现实有差距,但是“虚拟环境”才是受众认知的真正来源,并且受众会以对“虚拟环境”的认知来反作用于真实世界。左翼文学的媒介策略实际上就是通过文学媒介营造革命话语氛围,进而在读者认知中形成左翼文学主导中国文坛的印象。为了营造话语氛围,在1930年代值得一提的文学论争中左翼文学几乎从不“缺席”,“京海之争”中有它,“民族主义文学”论战中有它,文艺大众化讨论中亦有它,与新月派论争中也有它,大众语话题中还是有它,“反差不多”运动中仍然有它……在今天看来,许多论争不过是浮光掠影,文学价值也并不大,左翼文学也并非对每一个论争话题都兴趣盎然。它之所以不厌其烦地介入各种文学论争就是要在不计其数的文坛事件中频繁“出场”,最终由量变产生质变形成一种在1930年代的中国文坛左翼文学势力无处不在的媒介氛围。

总之,左翼文学睿智地洞察到三十年代文坛领导权的斗争在本质上是一场从报刊媒介层面所展开的媒介话语权斗争,所以控制报刊媒介对于争夺1930年代文坛的话语权至关重要。左翼文学在“京海之争”以及其他论争中所采用的媒介手段共同构建了左翼文学在三十年的媒介策略,它持续不断地利用文学媒介在各种文学论争中保持强势的“在场”状态就是为了塑造左翼话语独占鳌头的文坛氛围。当然,事实上1930年代的中国文坛显然不是左翼文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读者所感受到的只是一种媒介“幻象”。但是,结合1930年代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左翼文学的媒介策略也是被动选择的结果。“在三十年代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如果没有对于话语权的获得的自觉意识,没有一种对于营构强势话语的潜在政治欲望与能力,其结果,很可能是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文化专制之下的万马齐喑。”^[2]迫于现实压力,左翼文学必须采用这种代价较小的方式才得以立足文坛,“京海之争”则恰恰展现了19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是如何运用媒介策略在严峻的客观环境中保全自身并捍卫文学话语地位的。

〔责任编辑:平 啸〕

[1][美]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阎克文、江红合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1页。

[2]朱晓进:《政治文化与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8页。